

費維愷《中國早期工業化》3

太平天國運動之後，清政府被迫把軍政權力下放給曾國藩、李鴻章等地方督撫。厘金這項新稅種名義上供給軍費，各省送繳北京的僅佔年收入兩成。中央財政空心化，工業投資只能依賴地方官僚的個人才能。李鴻章可以挪用直隸練餉「息存」於招商局，張之洞卻在武昌和漢陽的官辦企業中賠光了老本，被迫把紡織局「出租」給商人。沒有統一的工業化政策，沒有制度性的財政支持，每一位督撫都在自己的地盤上孤軍作戰。

盛宣懷正是在這道裂縫中找到生存空間。他依附李鴻章的淮軍網絡，以官僚身分調動商人資本，以商人資本供養官僚事業。清朝的改革者困在官辦體制的牢籠裡，既依賴朝廷的授權，又需要商人的資金，兩者都無法割捨。

費維愷在《中國早期工業化》一書，用盛宣懷的案例展示了一條冰冷的地質斷層線。一側，有亞洲國家用三十年完成了工業化，艦隊開進對馬海峽。另一側，盛宣懷的招商局在甲午年間損失慘重，漢陽鐵廠的鋼軌賣不出去，電報線上的消息一條比一條壞。同時起跑的兩個國家，跑過同一條跑道的三十年，差距已經拉大到無法追趕。

書名：《中國早期工業化：盛宣懷和官督商辦企業》

作者：費維愷

出版社：中國社會科學院

李碩《翦商》1

1959 年，安陽後岡村。一座圓坑被考古隊打開，挖出七十三具人骨，頭顱朝下，嬰幼兒只剩頭蓋骨。李碩在《翦商：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》中，把這座坑放在全書開頭。他以近乎平靜的筆調，復原殺戮流程。

書中引李碩的判斷：對商人來說，在聚會典禮時殺戮異族，不僅是給諸神奉獻祭禮，也是讓圍觀者獲得精神刺激和滿足的盛宴。多處人祭坑留有蓄意虐殺的跡象。死者腰掛成串海貝，胸前布袋裝著三百枚貨貝，嘴裡含著入殮的貝殼。殺人者不覬覦錢財，任由銅鼎玉飾一同埋入。發掘者推測，這批死者屬於商人中級貴族「戍嗣子」家族，被紂王下令獻祭，連嬰幼兒也難倖免。

李碩統計：殷墟王陵區已發掘約一千四百座祭祀坑，每坑平均埋五到十具屍骨，保守估計被獻祭者逾萬。商朝是一台以人血為燃料的統治機器。甲骨文是龍山時代以降部落舊習未褪的男人們創造的文字，嗜血諸神主宰著蠻荒大地。

所謂「國之大事，在祀與戎」，祀排在戎前面。李碩主張，人祭並非自然退場，而是被周人強制抹除。歷史記憶自此留下空白，後人忘卻華夏這段血腥歷史。後岡祭祀坑的考古發掘，讓這段被抹除的歷史重新顯影。

翦商: 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

作者：李碩

出版社：麥田出版社

李碩《翦商》2

中國史書用一句話給殷周定了性：善惡有報，王朝更替。司馬遷、班固、司馬光順著這條線索，把牧野之戰寫成暴君與仁君的對決，把周王攝政寫成撥亂反正。兩千年來史家就在這個道德劇的框架裡反覆複述。

李碩在《翦商》中把這個框架徹底拆掉。牧野之戰不是仁君伐暴君。公元前 1046 年那場決定性衝突的真正內容，是周昌、周發父子在殷首都長期做臥底，記錄下商朝人祭的所有細節，回到西陲小邦後默默籌備數十年，以雷霆之勢一戰定鼎。改朝換代的背後，是一場文明基因的突變。

周人究竟看見了什麼？周昌在殷都生活多年，親歷過商朝種種人祭儀式。這些都被他寫進《易經》，書中記下俘虜被屠殺獻祭時的慘狀，也記下祭司穿著紅色祭服的細節。不過，文王保留的記錄非常含糊，只有藉助商代考古和甲骨文才能解讀出一部分。

書中引李碩的判斷：人祭宗教的消亡，源於外來文化的干預。羅馬人皈依了基督教，阿茲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取代，殷商則與之不同：周人並未開創新的宗教，採用世俗的人文主義立場，與極端宗教行為保持距離，所謂「敬鬼神而遠之」。這奠定了後世中國的文化基礎。

李碩將從龍山時代到商代的華夏文明稱為「華夏舊文明」，特徵是血祭、巫覡、祖宗崇拜的高度結合；周公旦一代人抹除人祭、創立禮樂之後，「華夏新文明」誕生，倫理、史官、世俗秩序取代血與火的祭壇。孔子離紂王和周公僅五百年，編「六經」時既保存部分真相，也主動掩蓋另一些，他要繼續周公的事業，重塑華夏。三千年的禮樂秩序，就從周公抹除血祭中誕生。

翦商: 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

作者：李碩

出版社：麥田出版社

李碩《翦商》

李碩在《翦商》中指出：周公時代變革的最大結果，是神權退場，這讓中國的文化過於「早熟」；戰國時代變革的最大結果，是貴族退場，這讓中國的政治過於「早熟」。兩次早熟撐起三千年中國。一位攝政的弟弟用禮樂設計，翻轉了商朝人三百年堆起的血祭王朝。周公旦，史載武王之弟，攝政七年，平定三監之亂，製禮作樂，封邦建國。孔子終身以周公為榜樣，夢中頻頻見之。在《翦商》一書的考古視角裡，周公來自西陲小邦，是一位政治工程師，他的任務很清楚：把商人的人祭宗教徹底廢除，不讓它死灰復燃。

周公系統性地廢除人祭宗教，抹去相關文獻與記憶，創立以祖先崇拜為核心的禮樂秩序，用「天命」取代商代泛濫的「帝」，亦即對「上帝」的崇拜。天命從喜怒無常的神靈，變成與統治者德行掛勾的政治倫理。天子若失德，天命便轉移。這套設計，把神權從王權中抽走，轉化為制約王權的道德壓力。

族群性格的更替十分徹底。周人謹慎，謙恭，重集體，富於憂患意識，這些都成了新華夏族的樣板品格。商朝的人直率衝動，思維靈活跳躍，有強者的自信和麻木。兩種性格的更替構成了一次成功的人格重塑。

「敬鬼神而遠之」這五個字，是周公為華夏文明設立的精神底線。孔子一生倡導的仁、孟子一生的義、《大學》的格物致知、《中庸》的誠明，這些後世儒家的根基，無不發源於周公對神權的系統性撤退。

翦商: 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

作者：李碩

出版社：麥田出版社

錢穆《中國經濟史》1

《中國經濟史》此書沒有用「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到商業社會」這三段論來切割中國經濟歷史。此書並非錢穆親筆，乃上世紀五十年代新亞研究所的講座錄音。授課者錢穆，國學大師，新亞書院創辦人，一九五三、一九五四年間在香港九龍偉晴街那間擠滿難民的課室裡開講。聽講者來自各階層：南來學子、本地青年、辦報商人、退休教師。筆錄著者葉龍先生，是錢穆在上海時期的學生，也早已成為名師；他把錢穆的授課語言逐字整理成稿，塵封數十年，至二十一世紀方首度面世。

錢穆治史，貫穿一條文化主義的主線。他的視角從土地、從人、從制度背後的價值秩序出發。井田、五銖錢、一條鞭法，這些經濟史上的物質遺存，在他筆下呈現的，是不同人群在不同地理、不同人口壓力下做的不同抉擇。對各民族歷史演進，他用歸納法梳理，再察看是否存在共同軌道。馬克思那套放諸四海皆準的共同軌道，在錢穆看來是西方經驗的產物，硬套中國歷史，會削足適履。

錢穆強調：中國歷史的演進，坐落在丘陵、山阪、洪水、旱地之上，先民栽下的是黍粟而非稻麥，居住在高地洞穴而非平原。經濟行為從未脫離具體的地理、氣候、人口密度。當下若仍用某套單一模型去推導中國未來的經濟走向，無異於重蹈十九世紀歐洲學者的覆轍，把事實放進一張尺寸不對的理論模板之中。

中國經濟史

作者：錢穆

出版社：中國計量出版社
